

中青文库

影响力的互动

中国公共政策传播模式变化研究

杜 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青文库

本书得到中国青年政治学

影响力的互动

中国公共政策传播模式变化研究

杜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影响力的互动：中国公共政策传播模式变化研究 / 杜涛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7
ISBN 978 - 7 - 5161 - 2970 - 8

I. ①影… II. ①杜… III. ①政策科学—传播学—研究—中国
IV. ①D6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361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韩天炜
责任印制 张汉林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75
插 页 2
字 数 310 千字
定 价 4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青文库》编辑说明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是共青团中央直属的一所普通高等学校。它于1985年12月在中央团校的基础上成立，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目前已形成了包括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留学生教育、继续教育和团干部培训等在内的多形式、多层次的教育格局。与其他已有百年历史的高校相比，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进入国民教育序列的历史还显得比较短。因此在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的浪潮中，尽快提高学校的教育教学与学术水平就成为学校建设与发展的关键。2002年，学校制定了教师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条例，旨在鼓励教师的个性化研究与著述，更期之以兼具人文精神与思想智慧的精品的涌现。出版基金创设之初，有学术丛书和学术译丛两个系列，意在开掘本校资源与译域外菁华。随着年轻教师的剧增和学校科研支持力度的加大，2007年又增设了博士论文文库系列，用以鼓励新人，成就学术。三个系列共同构成了对教师学术研究成果的多层次支持体系。

十几年来，学校共资助教师出版学术著作近百部，内容涉及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学艺术、历史学、管理学、新闻与传播等十多个学科。学校资助出版的初具规模，激励了教师，活跃了校内的学术气氛，也获得了很好的社会影响。在特色化办学愈益成为当下各高校发展之路的共识中，2010年，校学术委员会将遴选出一批学术著作，辑为《中青文库》，予以资助出版，用以对本校教师学术成果的集中展示，第一批共十六本出版后，有力地激励了本校教师的科研热情，也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很好的反响。本辑共推出六本著作，并希冀通过这项工作的陆续展开来不断突出学校特色，形成自身的学术风格与学术品牌。

<<< 影响力的互动

在《中青文库》的编辑、审校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编辑人员认真负责，用力颇勤，在此一并予以感谢！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科研处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	(1)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1)
第二节 核心概念界定	(5)
一 公共政策	(5)
二 模式、传播模式和传播模式变化	(7)
第三节 关于本书的说明	(9)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研究方法	(11)
第一节 西方政治传播相关研究	(11)
第二节 国内公共政策传播相关研究	(16)
第三节 中国公共政策具体传播模式研究	(20)
第四节 研究假设和研究方法	(27)
第五节 研究框架与结构安排	(29)
第三章 中国公共政策传播系统分析与传播模式变化	(31)
第一节 传播、政治传播与公共政策传播	(31)
第二节 中国公共政策传播系统的影响要素分析	(34)
一 政府——公共政策传播的主导者	(35)
二 大众传媒——公共政策传播的制度化渠道	(37)
三 公众——公共政策传播的对象和反馈者	(42)
第三节 公共政策传播系统的变化及其动力源	(45)
一 变化的外部动力源之一——传播技术变化	(47)
二 变化的外部动力源之二——社会变化	(49)
三 变化的内部动力源——政府、大众传媒和公众	

角色的相互适应	(52)
四 政府、大众传媒、公众传播关系在互动中变化	(60)
第四节 中国公共政策传播模式变化	(63)

第四章 突破组织传播

——由直线模式到波形模式出现	(67)
第一节 直线模式及其优势与缺陷	(67)
第二节 波形模式及模式变化背景	(72)
第三节 模式变化的现实发展——从封闭走向逐步开放	(75)
第四节 波形模式的互动实现	(81)
一 政府响应民意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81)
二 大众传媒推动政策信息公开	(83)
三 公民推动政策信息公开	(86)
第五节 波形模式及其局限性	(88)
一 传播互动的缺陷	(88)
二 传播内容的缺陷	(88)

第五章 大众传媒中介的传播

——由政策宣传模式到新闻发布模式出现	(90)
第一节 政策宣传模式及其优势与缺陷	(90)
第二节 新闻发布模式及模式变化背景	(96)
第三节 新闻发布模式的现实发展——走向常态化	(101)
第四节 新闻发布模式的互动实现	(106)
一 制度设计上的双向传播功能	(106)
二 现实发展中的双向传播表现	(107)
第五节 双向互动的环节	(110)
一 政府的互动策略	(111)
二 大众传媒的互动策略	(118)
第六节 新闻发布模式及其局限性	(124)
一 制度设计中的缺陷	(124)
二 实施中的互动不足	(127)

第六章 与公众的直接传播

——由窗口模式到压力模式出现	(132)
第一节 窗口模式及其优势与缺陷	(132)
第二节 压力模式及模式变化背景	(134)
第三节 压力模式的现实发展——从弱小走向强大	(142)
第四节 压力模式的互动实现	(150)
一 设置公共政策议程影响政府决策	(150)
二 利益聚合表达形成政策博弈力量	(159)
三 网络舆论监督对公共政策制定、实施全过程形成 压力	(164)
第五节 压力模式及其局限性	(169)
一 结构失衡的局限	(169)
二 警惕被操纵的民意	(172)

第七章 个案研究

——刺五加不良事件中的公共政策传播	(174)
第一节 个案背景	(174)
第二节 政府网站和组织传播	(175)
一 政府网站发布动态消息	(175)
二 组织传播	(177)
第三节 大众传媒与政府的互动	(177)
一 大众传媒选择自己的报道框架	(177)
二 新闻发布会	(181)
第四节 公众的参与	(182)
第五节 案例研究启示	(184)

第八章 结语

第一节 主要结论和创新点	(187)
第二节 研究的不足之处	(190)
第三节 未来研究的建议	(191)

深度访谈及调查资料

做好政府和媒体间的桥梁纽带

——专访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新闻发言人颜江瑛…………… (193)

新闻发布会应实现双向互动

——专访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曹劲松…………… (199)

新闻发言人要回应热点问题

——专访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 (204)

政府新闻发布要实现常态化

——专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局局长郭卫民…………… (209)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自主新闻发布定量研究报告

(2009年7月)…………… (214)

一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214)

二 研究方法…………… (215)

三 新闻发布现状概述…………… (215)

四 自主新闻发布现状内容分析…………… (219)

五 记者反馈情况的定量分析…………… (225)

新闻发布会评估调查问卷…………… (234)

参考文献…………… (239)

后记…………… (261)

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脱离公共政策，就无法想象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生活。从出生到进坟墓，人们或受益于公共政策，或受困于公共政策。在中国内地^①，人一出生就要受到户籍制度的节制，上学要受到教育政策的影响，出行面临着交通政策的规范，工作要受到行业政策的限制，结婚后要遵守计划生育政策的管控，收入要受到分配、税收等政策的调整，买房要承受房产政策变化的风险，就连正常饮食也需要国家食品监管政策的实施来确保安全。可以说，人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公共政策之网中。小到红绿灯的位置设置，大到国家领导人的选举方式，都是公共政策的具体体现。

公共政策是政府等社会公共权威在其社会政治活动中的重要内容，其制定、执行和评估贯穿于国家的社会政治活动全过程。有学者曾言，当代中国正在走入“政策时代”^②。中国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需要制定一系列的公共政策来调整各种利益关系，规范人们的行为，推动国家的发展，维护社会的稳定。在经济转轨的过渡时期，几乎所有重大改革措施都是通过公共政策推动的。从社会经济发展来看，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公共政策问题“高发期”——不论是在政治、经济领域，还是在文化领域，中国都需要对大量的公共政策问题进行创新性、建设性的研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和社会的发展，政府为了解决各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公

① 因政治环境不同以及国家的“一国两制”政策，本书所指的中国不包括我国港、澳、台地区，后同。

② 唐钧：《中国正在走向社会政策时代》，《北京日报》2005年4月14日。

共问题而制定的公共政策，如社会保障政策、农村发展政策、劳动就业政策、食品安全政策、医疗卫生政策、教育政策、住房政策、人口政策等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如被公众称为“新三座大山”的“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问题，都与政府公共政策直接相关。

公共政策是综合性、应用性很强的研究领域。无论西方还是中国，这一领域不仅为政治学者所关注，而且成为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统计学、心理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的学者共同涉足的重要研究领域。

关于从不同学科的视角研究公共政策，学者何志武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从政治学的角度理解公共政策，可以分别把政治或公共政策涉及的权利或利益分配看作是一个控制与反控制过程、讨价还价的交易过程或博弈过程。管理学视角中的公共政策，是把公共政策视为一种类似于企业管理的社会管理活动，是通过科学的政策决策和有效的组织实施政策，以最小成本与代价达到政策目标。经济学视角下的公共政策就是市场与政府的相互关系，是寻求如何在市场自由与政府干预之间达到平衡，在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获得均衡。社会学视角下的公共政策，主要集中在从社会的角度理解不同的公共政策效果，理解政策制定者、政策执行者和政策目标群体的心理、需求和行为。伦理学视角下的公共政策研究途径，一方面强调政策研究中的价值分析，另一方面强调政策研究本身的伦理规范和政策本身的正当与公平问题。”^① 从多学科的角度研究公共政策，不仅是对公共政策体系研究的深入，也为各自学科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

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评估等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有效地进行公共政策的传播；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本身也是制定科学公共政策、确保政策顺利实施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无论是从公共政策系统还是从公共政策周期来考察，传播问题都是国家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中的重要内容。^② 从系统论角度讲，政治体系的输入、输出、反馈是传播的具体体现；从公共政策周期来考察，在公共政策吸纳意见、制定实施和评价反馈的各个过程和环节中，都离不开政府、大众传媒和公

① 何志武：《大众媒介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机制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中科技大学，2007年。

② 参见〔美〕安德森《公共决策》，唐亮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彭芸《新闻媒介与政治》，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2年版。

众间信息的流通、反馈和互动，离不开三方的共同参与。

公共政策是政府、大众传媒和公众共同关心的重要内容。公共政策是政府公共行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因为其强大的社会影响，对公众又极具知悉意义，有很高的新闻价值，是一个巨大的新闻源，注定被大众传媒所关注；公共政策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政治参与密切相关。在公共政策传播中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是现代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这给我们提供了从新闻传播学视野研究公共政策的可能。

在中国，公共政策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中国没有采取西方式的代议民主制，公共政策在政治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有学者称，西方通过选票判别民意取向，中国则依靠政策通达民意。^①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公共政策在中国政治和公共事务中所起的作用，远远大于其他国家。^②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改革的突破口并不在于实现竞争式选举，而是在各个方面促进老百姓与利益相关者参与和他们利益相关的事务决策过程，这才是最重要的，而且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③无论持何种政治观点，推动大多数人参与公共政策的决策以及传播过程，既是中国民主政治本身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民主化进程的必由之路。

公共政策学和新闻传播学的“联姻”早已不是新鲜事了。一些先知先觉的学者或从政治学等学科出发，或从新闻传播学出发，研究公共政策传播问题。如有政治学者研究公共政策的政治沟通问题；有新闻传播学者从政治传播学视野去审视公共政策的全环节；有学者从政府公关角度探讨公共政策的传播；也有多个学科的学者研究大众传媒、公众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等（参见文献综述部分）。这一方面使本书有了跨学科背景，有相对较多的前人研究作为参考和研究的起点；另一方面，也要求进一步的研究必须要有新的取向和视角。

本书从影响力的互动这一视角对我国公共政策传播模式的变化进行

① 唐晋：《大国策：社会发展模式》，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② 黄宗问：《公共政策：政府体制的函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年第3期，第57—58页。

③ 王绍光、石剑峰：《王绍光谈民主和“选主”》，《东方早报——书评周刊》2009年10月18日。

研究。主要是基于四点考虑：

第一，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把政策制定仅仅看成是政府“自己的”或“内部的”事务，不重视乃至不愿意与社会、公众沟通，所以政策效果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① 这些观念体现在学术研究上，使得既往政策传播研究较多地集中在政府“如何运用传播学原理更有效地把政策信息原原本本地传递到政策受众，发挥政策的最大效用，取得政策的最大效果，最大化实现政策目标”^②。本书从互动角度出发研究公共政策传播现象，即“人是资格能力和沟通能力的行动者，他们是积极主动地建构着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因此，社会是互动的，这种互动不仅表现在个体与个体，同时也表现在行动者和社会结构”^③，在研究视角上有所创新。

第二，从严格意义来说，公共政策传播涉及政府、传媒、公众以及不同流派和决策模型所注重的群体，包括精英群体、非政府组织、利益集团，等等。分类不同，重点不同，得出的结论各有其侧重点和解释力。因此，各学科学者在研究公共政策时，均要进行理论简化和概括。杜伊奇认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选择是不可避免的。一个人穷毕生之力也难以对一个国家的政治过程的所有细节进行理解和描述。显然，选择是精华所在。”^④ 甚至有研究者认为，在政策科学研究中，不使用概念模式几乎是不可想象的。^⑤ 本书从传播模式角度进行研究，抓住政府、大众传媒、公众三个最重要因素，实现了合理简化，有利于研究的展开。

第三，我国公共政策传播领域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有学者认为，媒介技术造成的媒体融合趋势和我国正在进行的文化体制改革是当前新闻与传播学研究的两大动力，围绕这两大变化，可以从传播学理论角度研究传播模式的变迁。^⑥ 公共政策传播的理论发展从框架构建到研究传媒在公共政策传播中的作用，再到公共政策与公众关系的研究，从

① 唐钧：《中国正在走向社会政策时代》，《北京日报》2005年4月14日。

② 段林毅、王官仁：《政策传播论》，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

③ 黄旦：《由功能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化》，《新闻大学》2008年第2期，第46—48页。

④ Karl W. Deutsch. *The Nerves of Government: Model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3, p. 4.

⑤ 宋锦洲：《公共政策，概念、模型与应用》，东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6页。

⑥ 宋建武：《新闻与传播学研究的两大动力》，《新闻与传播》2009年第3期。

目前研究发展脉络来看,研究公共政策传播模式及其变化正当其时,符合理论发展和现实发展的逻辑,“传播模式变化”有可能成为一种有用的理论分析工具和研究框架。

第四,本书的模式研究是一种宏观性思维,可以避免以往研究中政府、大众传媒、公众三者分离,尤其是单一强调政府在公共政策传播中主导作用的功能主义研究倾向。公共政策,尤其是决策,是有意识的选择活动,其影响因素涉及很多方面,如政治压力、社会压力、时间压力、社会经济环境、程序限制,等等。在对公共政策传播的研究过程中,很难不涉及价值判断。笔者曾和一些学者就国家住房政策、教育政策、卫生政策等的合理性进行探讨,发现不同人的价值判断大相径庭。因此,笔者如果过多地从价值判断角度切入,很可能会陷入“先入为主”的窠臼,使研究的客观性大打折扣。而提出价值判断较少的描述性传播模式,可能会在理论上有很好的收获。

本书提出当代中国公共政策传播的多种模式,是对现有公共政策传播理论的发展,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描述了中国公共政策传播模式的变化,在传播模式的建构方法上有创新意义。

从本书研究内容的可行性来看,笔者曾从事政府工作,有公共政策传播的实践经验,有一些感性认识,因此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希望能把过去的积累和专业学习结合起来,成为研究的基础。导师李希光教授在研究政府新闻发布和公共政策传播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曾指导并和笔者一起做过中国教育政策传播的相关研究。^①他对笔者进行的研究给予了极大支持,促使笔者勇于选择这一主题作为博士论文选题。

第二节 核心概念界定

一 公共政策

在国内外政治学中,有关公共政策的概念解释非常多。对公共政策的界定,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和卡普兰在创立政策科学时曾提

^① 李希光、杜涛:《超越宣传,变革中国的公共政策传播模式变化》,《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4期,第71—79页。

出,“公共政策是一种含有目标、价值和策略的大型计划”^①。

美籍加拿大学者戴维·伊斯顿认为:“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作权威性分配。”^②

美国学者詹姆斯·安德森认为:“公共政策是由政府机关或政府官员制定的政策”,而“政策是一个有目的的活动过程,而这些活动是由一个或一批行为者,为处理某一问题或有关事务而采取的。”^③

美国学者托马斯·戴伊认为:“公共政策是涉及大量人才和资源或关系到很多人的政府决定;凡是政府选择要做的或不做的事情就是公共政策。”^④

国内学者陈振明认为:“政策是国家机关、执政党及其他政治团体在特定时期为实现或服务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目标所采取的政治行动或所规定的行为准则,它是一系列谋略、法令、措施、办法、方法、条例等的总称。”^⑤

张金马认为:“公共政策是执政党和政府采取的用以规范、引导有关机构团体和个人的行为准则或指南。”^⑥

陈庆云等认为:“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在有效增进与公平分配社会公共利益的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⑦

钱再见认为:“公共政策就是政府等社会公共权威为实现社会目标、解决社会问题而制定的公共行动计划、方案和准则,它具体表现为一系列的法令、策略、条例、措施等。”^⑧

综合以上概念,伊斯顿的定义,即“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作权威的分配”深入到了公共政策的内核,揭示了公共政策的本质。这一定义突出了三个思想:1. 制定公共政策是为了价值分配;2. 分配的范

① H. D. Lasswell, Kaplan, Power and Society.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 1963, p. 70.

② David Easton. The Political System. New York: Knopf, 1953, p. 129.

③ [美] 安德森:《公共决策》,唐亮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④ Thomas R Dye, Understanding Public Policy, 9th ed. Prentice Hall, 1998, pp. 2-4.

⑤ 陈振明:《政府再造——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述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9页。

⑥ 张金马:《公共政策分析》,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页。

⑦ 陈庆云:《现代公共政策概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⑧ 钱再见:《公共政策学新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围是全社会；3. 分配的影响力是权威性的。价值分配即为利益分配，既包括物质利益的分配，也包括精神利益的分配。公共政策的本质是社会利益的集中反映。^①

在具体表述上，本书同意国内学者钱再见的界定，具体分析如下：

一是关于公共政策的主体。这里政府不是“小政府”即狭义上的政府——行政机关或内阁，而是如朱光磊等学者所定义的“大政府”，即广义上的政府，是指“代表中国国家主权的中国政府总体或者说代表整个中国国家机构”^②。政府是公共政策的直接主体，它以公共权力为后盾，是社会的公共权威，因此可以要求政策对象接受并执行合法的政策。其他企业、社会团体没有政府所具有的国家公权力，其主张还不能成为公共政策。

二是是否以公共性为取向。即公共政策应是以解决公共问题为取向的，必须遵循公平、正义的原则，必须以公共利益为最终目标取向。“公共利益是指社会或国家占绝对地位的集体利益而不是某个狭隘或专门行业的利益。”^③政府对全社会的利益进行分配，其依据就是公共利益的原则，而不是有意向某个利益群体倾斜而忽视其他群体利益。

三是强调公共政策是一种公共行动计划、方案和准则（“通常表现为纲领、决议、方针、指示、宣言、命令、声明、会议纪要、领导人的讲话或报告，具有指导性、原则性、号召性，其内容比较概括，很少用具体的条文规范来表述”^④），而不是泛化的“过程”或“选择”，概念外延有所缩小，易于在案例选取和理论阐释中采用。

二 模式、传播模式和传播模式变化

模式是现实世界部分化、简单化和抽象化的理论简约。一个模式试图表明一种结构或过程的主要组成部分以及相互关系，达到直观和近似的效果，是简约再现人类社会活动的理论描述方式。政治学者多伊奇（1963）在《政府的神经——政治传播和控制的模式》一书中首先使用

① 陈庆云：《公共政策的理论界定》，《中国行政管理》1995年第11期，第26—29页。

② 参见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3页。

③ [美] E. R. 克鲁斯克、B. M. 杰克逊：《公共政策词典》，唐理斌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2年版，第930页。

④ 陈庆云：《现代公共政策概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了模式的概念。模式能揭示各系统之间的次序及其相互关系，能使人们对事物有一个很难从其他方法中获得的整体形象，提供适用于不同状态的普遍图景。他认为，模式具有四大独立功能：组织功能、启发功能、预测功能和测量功能。如今，模式概念已被广泛地运用在社会科学研究当中。

在传播学研究中，模式的使用也是很普遍的。传播学者麦奎尔和温德尔甚至用“模式”构建了大众传播研究的整个体系。按照《大众传播模式论》的论述，“模式是用图像形式对某一客观现象进行有意简化的描述。每个模式试图表明的是任何结构或过程的主要组成部分以及这些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①。要探讨传播的过程和结构，有时必须借助简化的形式再现传播现象，进而探讨传播效果、传播过程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

本书的模式研究有以下几个需要说明的问题：

第一，多种传播模式可以共存。传播模式研究者承认多种模式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如学者祝建华就认为在大众传播过程中，单一普适的传播模式是不存在的，现实的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适用于整体或局部的多种模式的可能性。“我们比过去更坚定地认为任何一个包罗万象的传播模式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②

第二，传播模式并不是一经建立便永恒不变。模式研究同人类社会、传播活动本身一样，也是一个不断发展、逐步完善的过程。随着理论发展和社会变动，自然会出现新模式的建构和旧模式的衰落或消亡。多伊奇（1963）在《政府的神经——政治传播和控制的模式》中就提出了机械模式、有机体模式、博弈模式和控制论模式等及其发展变化。学者邵培仁认为，任何事物都是不断变化、发展着的，都是变动不息的。作为人的认识的反映——传播模式，也必然要随着认识对象的变化而变化，甚至更换。^③《大众传播模式论》第一版（1997）介绍了35个独立的模式，第二版（2008）则有增有删，共66个模式，做了“脱胎换骨的修改和扩展”（译者祝建华语）。正如祝建华所说：“我们必须强

① [英] 丹尼斯·麦奎尔、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祝建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

② 同上书，第11页。

③ 邵培仁：《传播模式论》，《杭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第159—169页。